

实践民族学

——基于中国实践的民族学与人类学

何 林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实践民族学”是在当代中国背景下,以实践的视角“再写”民族学与人类学,即重新“盘点”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历史与现状、定位与构成、需求及发展趋势,勾勒一个以应用、实践为目标的相对整合的民族学学科体系。民族学、人类学的整合及本土化过程,必须在应用和实践中实现,且打破“田野”框架,超越传统的范畴,拓展学科领域。民族学或人类学是一个包括研究与实践的过程:来自田野,回到田野;在于实践,源于实践。

关键词:实践民族学;应用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体系;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4)05-0082-07

Ethnology for Practice: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Based on the Practice in China

HE Lin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China's Southwest Frontier Ethnic Minorities,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The Ethnology for Practice here is to rewrite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from the view of practicing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China, namely to sketch an comparatively integrated ethnological discipline system with the aim of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rientation and structure and even needs and development. The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and localization should be realized with practice and enlarged the fields of study by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Ethnology or anthropology is a process includ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from the field and back to the field; for practice and from practice.

Key words: ethnology for practice; applied anthropology; ethnology; discipline system; localization

一、作为实践的民族学

民族学与人类学本身就是实践的。不论是西方人类学发展史,还是中国 20 世纪初引进西方人类学的初衷及随后数十年的努力都说明了这一点。文化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是为社会现实服务的,泰勒将之称为“革新者的科学”“决策的科学”。西方人类学的应用与人类学的诞生及发展几乎同步,先后经历了 1914 年以前的萌芽时期,1914—1938 年的殖民地间接统治时期,1938—1970 年的扩展时期以及 1970 年以后的决策时期,至今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各相关领域中。^[1]³³ 例如,在日本先进的工商业大军背后,还有一支包括人类学在内的文化大军作为支柱,其能基于雄厚的知识对世界任何地区突发的课题作出有利的反应……日本的人类学家做了多方面研究,大到为政府的决策服务,小至为一种商品寻求销路。^[2] 在中国,知识分子有着“经世”的传统,早期

的人类学学者也不例外。20 世纪初民族学作为“西学”被引进之时,曾被定位为“不仅是理论的科学,而且也是应用的科学,不仅与学术有关,而且与实际政治如边政边教的推行、民族文化水准的提高都有关系”。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学在乡村建设模式、边政建设、生育制度建设等领域做了大量的应用研究。^[3] 这时期,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与知识被用来研究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如《中国农民生活》(即《江村经济》,费孝通,1938 年)作为一本利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我国汉区农民的应用之作,其目的在于改善中国农民生活,从而改造社会。^[4] 20 世纪 40 年代,虽然还没能实现有效的应用,但“运用人类学的观点分析民族复兴的条件……进行改革……”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努力一直在进行;20 世纪 40 年代,“研究有关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边政学有所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强调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中国社会文化

收稿日期:2014-10-0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实践民族学——基于中国实践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重构”(08JC850005)。

作者简介:何林(1971—),男,云南石屏人,民族学博士,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副教授,从事东南亚族群、少数民族宗教、实践人类学/民族学研究。

问题的实际结合起来,并对北方的有关民族展开深入调查研究;20世纪50年代,一些有着西方人类学、民族学专业背景的学者参与了基于中国国情的民族识别^[1]^[54]与国家民族建构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学科被取消后,中国的民族学或民族研究,包括由政府部门主持的民族工作主要服务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一条独立的学科发展道路。

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下,民族学、人类学的前途在于其应用与实践。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现状来看,一方面是学科研究发展的狭窄化,应用程度低,人类学或民族学的专业机构较少专事应用研究及实践工作,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困难,而许多从事民族学专业性研究的学者并非民族学的专业背景;与此同时,在一些相关项目的实践中,来自西方的指标体系本土化程度低,表现为水土不服,实施过程中中外方专家分歧大;从当前国内各级项目申报目录看,涉及应用研究的比例是很高的,但真正的应用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在有关项目实践活动的参与方面,民族学、人类学及相关学者的参与度很低。笔者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的前途在于应用和实践。这首先是民族学本身的需求及机遇,如果一门学科不能应用和实践中获得认可,其发展自然受限,甚至被边缘化;从民族学、人类学专业招生来看,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导致生源不足,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毕业生,包括本科生及研究生,就业前景不容乐观,同时由于入门门槛低,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获取文聘的便捷工具;而从当前中国的需要来说,诸多的行业都需要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参与,需要相关专业人才或具有一定学科基础的人员,但由于学科应用程度低甚至边缘化的原因,需求并未得到有效表达。从西方应用人类学的服务领域及中国民族研究与民族工作的实践来看,实践民族学的前景广阔,而且在当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在增强国家软实力以及海外实践方面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总的说来,中国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应用及实践程度还比较低,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开始恢复以来已在重新引进西方人类学方面积累了一定成果,人类学的应用研究也拓展至农业、林业、环保、移民、教育、妇女、卫生等领域,中国人类学学者也介入了一些比较前沿的项目实践活动。^[5]与此同时,民族研究,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稳步发展,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被广泛运用于民族研究中,而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也几乎和民族研究的领域重合,不论是人类学还是民族学的研究生,都学习近似的课程,从事范围相近的研究,人类学与民族研究越来越接近,并以“民族学”作为中心的连接点。以此角度来看,可以说民族学涵盖了人类学与中国特色的民族研究的范畴、理论和方法的范式。

因此,从背景及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应该是一个整合的“大民族学”的范畴,包括来自西方的人类学、中国本土独立发展而来的民族学或民族研究,其研究理论和方法将完成本土化进程并符合中国国情。笔者同意“1950年人类学被取消一方面是人类学的不幸,同时也是本土民族学或民族研究独立发展的时期”的看法:“回顾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非常时期学科被取消的历史并非空白,而是对今天的学术发展和本土化具有重要影响。”^[6]笔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本土化首先是与本土民族学的整合,其次是人类学、民族学的应用与实践,或是人类学理论方法在中国田野的实践。在这样一个整合了的系统中,在学科结构上既拥有来自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研究范式,又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基于中国实际的研究及实践经验,特别是在应用实践方面,所谓的本土化必须是在应用和实践中实现。

二、中国民族学的构成与学科整合

相对于西方流派众多但系统化的人类学或民族学,中国民族学的构成情况要复杂一些。首先是20世纪初就引进的西方社会/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其次是20世纪50年代后兴起的主要服务于中国民族识别及民族工作的民族研究,还有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逐步恢复后,被“重新引进”的人类学以及与本土民族学的互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批“海归”学者翻译了大批学术著作,重启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而自主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或民族研究继续按原有轨道发展,二者在理论系统及研究方法上已大相径庭。按照国家1997年颁布的“教育部学科门类划分”即《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12个门类(2011年4月增至13个门类)中,人类学(030303)、社会学(030301)、人口学(030302)等同属法学类(03)之社会学(0303)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而民族学(0304)则是法学类下的一级学科,包含民族学(030401)、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030402)、中国少数民族经济(030403)、中国少数民族史(030404)、中国少数民族艺术(030405)等二级学科。而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2007年度),社会人类学(SHQ)与社会学史(SHA)同列社会学目录之下;民族问题研究则包含了民族研究的目录(民族问题理论、民族史、民族问题研究其他学科、世界民族等)及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由此看来,中国独立发展而成的民族学或民族(问题)研究不论在学科地位、认知度、发展程度、成果数量及应用程度上均远超社会/文化人类学。但从人类学看来,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研究或民族学被认为缺乏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研究主要关注民族事务或少数民族事务,因而发展空间比较狭

窄。中国人类学虽然已趋系统化,但至今还处在继续学习、消化西方理论与方法的阶段,本土化程度低,还谈不上建立中国特色的学科系统,在应用和实践方面,依然十分薄弱,许多专业的研究机构对于应用和实践之类的研究方向并不看好。这些因素都可使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

根据人类学传统的“四分法”^[7],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大致相当,甚至指的是同一门学科^[8],但这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划分,在中国背景下,其构成更为复杂。二者除在研究范围有所重叠,理论方法可以互通外,民族学早已被贴上了“民族研究”的标签,“是一门以民族为对象的社会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9],由于这一特性,民族学在名称上又被经常地与“民族研究”混而用之,而中国的民族研究及由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机构执行的“民族工作”与引自西方的人类学(或民族学)有着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从中国的学科划分来看,民族学与人类学分属不同的层次及学科领域,但从相关学科科研机构的设置及学者构成来看,不论是民族学、人类学,还是民族研究或民族工作,某种意义上又被视为同一领域,即关乎民族的研究。在一个综合性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机构,或一个知名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身上,都集中反映了上述研究领域的特点。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民族学应该被视为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大民族学”的范畴,即包括舶自西方的人类学或民族学、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研究及实践性更强的民族工作——这是一个有利于民族学与人类学本土化及发展的学科范畴。笔者认为,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本土化需要经历两个过程:其一,引自西方的人类学或民族学与具有本土特色的民族研究及民族工作的整合;其二,学科的应用与实践。

从技术结构来看,整合后的中国民族学不论在理论方法、研究范畴、实践上,都包括了西方人类学、中国民族学(民族研究)以及民族工作的内容。首先是理论方法上的整合及本土化,使之符合中国的特点并在中国研究的背景下得到发展,使得原有的民族研究领域范围及理论方法得到大大提高,研究不仅限于有关“民族”的研究,而且扩展至诸如都市问题、妇女、卫生、教育等方面,同时从本土民族研究及民族工作中获取经验,在这些田野调查和研究、实践中,使民族学与人类学立足本土,尤其是在有关民族、少数民族为方向的应用与实践方面。如此,基于中国实践的民族学形成一个在学科范畴、理论与方法及应用实践上的系统。

为使人类学、民族学在我国各领域中发挥必要的作用,毕业生能够获得适合的就业机会且有所作为,需要重构基于实践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体系及从业人员体系。在技术层面,对这一学科通过梳理并“重写”民族学、人类学,基于西方人类学、中国民

族学及民族研究、中国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重构基于实践的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一个大致为“理论与民族志研究——应用研究——实践”的系统。与此同时,这一整合过程需要民族学、人类学学者梳理中西方的成功经验及民族学的本土化成果;需要国家在政策及策略上的支持及干预。例如,支持将民族学、人类学或相关科目及内容纳入有关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岗位的考试等。基于实践的民族学、人类学的重构及整合是可行的,首先,各行业、领域的巨大需求是这一活动的驱动力,其次是大批的民族学专业大学生、研究生是强大的后备军;再次许多高校,如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已形成了一定系统的研究成果,不论是在基础研究、民族学田野调查基地建设乃至海外实践等方面都有了较好的基础。

三、学科体系的重构

如果把民族学与人类学看做一个网格结构的话,其研究及服务的领域、对象是纬线,而理论方法、不同层次及领域的学者共同构成经线。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的重构将围绕上述结构及关系展开。

(一) 来自田野,回到田野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重要传统和基础的研究步骤,人类学或民族学因而可被称为“来自田野”的学问,即在一定范围内开展民族学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撰写民族志或学术论文——传统人类学的成果表现形式。这应该是一种完美的民族学研究愿景,一种许多民族学、人类学学者所习惯的学术生态。但在实践视野中,民族学、人类学将使研究向应用和实践迈进一步。这将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拥有更为丰富的研究资源。因此,实践视野中的民族学、人类学是一个“田野—理论—应用/实践—理论……”的循环过程。

不是所有的民族学研究都必须走向实践,也不是所有的实践活动都必须按民族学的“标准”范式完成相关的学术研究,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天然紧密的。民族学的实践本身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的工作,从实践的视野来看:(1)基于田野调查的基础性学术研究产生了民族志(较全面的田野描述)、学术论文、田野报告等成果,从而为实践活动准备了资料条件,同时提出了实践的方向及选题;(2)开展应用研究,实现学术成果向应用方向的转化;开展针对性的田野调查,基于前期研究讨论并评估相关选题的意义、价值、目标、可行性、实施方式及可能面临的问题等;(3)进入实践阶段:设计实践项目,制订项目实施计划,组建项目团队,根据一定指标体系设计并开展基线调查、需求评估、可行性报告及实施细则并做好实施准备;(4)项目实施:按既定计划开展,实时监测及反馈,阶段性评估,项目结束时进行项目评估;(5)撰写项目报告或总结——也

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实践成果将是下一实践活动或更为深入的实践活动的基础。现就笔者经验举例如下:

笔者曾于2004—2006年在云南怒江的一个怒族村开展田野作业,2006年在大量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篇关于多元宗教的博士论文及其他论文,2007年以后继续在该村及该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其他研究项目)。在此期间,笔者发现可以在该地区开展一些实践性的项目,如嗜酒问题的干预、村寨文化的传承等。同时发现,许多通过地方政府实施的项目,如扶贫、村落搬迁、房屋抗震改造等,启动前缺乏系统规范的调研及相应的应对措施,最终收效甚微,甚至导致村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减低乃至抵触,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损失。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当地政府实施了房屋加固计划。这项工程承包给了一家外地建筑队,建筑队采取了在梁柱连接处加定木条和房屋立柱加装水泥保护墩的措施。由于计划实施前并未进行必要的调研,这一措施对于增强抗震功能的效果不得而知,但从村民反映的情况来看,此计划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作为当地村落房屋的主要样式,井栏式建筑的整体性本身十分牢固,只是九根柱子立于垒起的石块上,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加装水泥墩子可有助于加固房屋。但根据村民的反映及实地查看,由于当地雨水丰沛,所以加装水泥墩而嵌入其中的木柱则将因积水而腐烂,房屋使用寿命大大减少,原来可以使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立柱,在加装水泥墩后可能只有3~5年寿命,这对于几乎未经历过地震的村民来说,无异于画蛇添足。因此,许多村民在工程结束并验收后私自把保护墩拆除。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为保护怒江上游贡山怒族的族群文化,2010年,笔者从云南大学申请了“民族文化进课堂”的项目,计划在贡山县双拉村小学开展,即在小学的课程中设置民族文化课程,聘请当地怒族民间艺人每周授课两次,内容包括族群历史、民间故事、民间歌舞等。但由于当地为体现“教育公平”,实施了“集中办学”的计划,双拉小学被撤消,合并到丙中洛乡小学集中上学。经调查发现,这一变故进一步割离了儿童及青少年与其家庭、村落社会的联系,加剧了民族文化的流失,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从小学就离家的孩子(除寒暑假外,平常每月可回家一次)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回到村中,已难以适应村落生活,除少部分继续升学并离开村落外,大部分的青年要么选择到外地打工,要么回到村落重新适应村落生活。因此“村寨文化班”更加必要。因此我们在村里办了一个“怒族民间文化课堂”,每个周末开两次课,吸收返家的孩子及村中青年参加,学习民族的历史、歌舞。与设立于大城市的民族文化传统传习所不同,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就地保护”的模式。项目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作为一个实验性的实践项目,我们一边研究

一边开展。

(二) 实践的“田野”

西方应用人类学按领域进行划分,包括都市发展、国防事务、公共教育、能源开发、环境问题、经济开发、教育问题、健康与医药、居地卫生、技术转让、劳工与就业、农业问题、农村发展、企业管理、人口调查、人际关系培训、人口控制、水资源开发、酗酒与吸毒问题、新闻传播、刑事司法与裁判、渔业研究、营养问题、政府与公共行政、住房问题等诸多领域,重点关注贫困、犯罪、妇女流动、社会文化变迁、艾滋病、民族生计等方面;从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的视角来看,可有政策研究员、评价员、影响评估员、需求评估员、计划员、研究分析员、行政管理者、公共参与专家、变迁代理人、训练员、辩护人、防治专家、专业证人等。^{[1][6]}笔者认为,除上述技术性划分外,在中国背景下还可以按照实践主体进行划分,包含政府、非政府公益组织(NGO)、商业公司、海外实践等区块。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民族学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活动中,特别一些针对民族或少数民族事务的活动,所涉及的领域还可得到进一步拓展,即从较单一的民族事务扩大到上述诸多领域。而且政府作为实践主体的活动与非政府组织主导的活动其目标及操作方式有所不同的;非政府公益组织作为实践主体,在西方非常普遍,几乎涉及上述所有领域,甚至一些政府组织的实践也是通过民间组织来执行的,我们也可考虑通过招标、委托等形式,把一些原来依靠政府职能的活动,交由非政府组织或商业公司来完成;在商业领域,民族学、人类学可以预见地在包括商务咨询、制造业、推广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国际贸易等方面中有所作为,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研究基础,目前还未形成气候,因而这是民族学、人类学未来的一个可获突破的领域;关于海外实践,在西方国家其几乎与人类学的诞生与发展同步,如殖民地管理及商业应用,而在中国却才刚刚开始,并将伴随着中国的公共外交活动的开展逐渐取得突破。关于民族学、人类学的应用与实践,在商业领域是尤其重要的。

随着民族学、人类学学科领域的拓展,实践视野中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将超越传统的范畴,即不再局限于某一族群一定人口数量的社会文化完整的社区,而是一个富有弹性的范畴,可以是一个民族村落,还可能是一个工厂、一个城市社区、一个商业公司、一个市场甚至是一个领域或一个民族国家。同样,田野可以是一个实体,也可能是一个虚拟的社区或空间,如网络社区、俱乐部等。目前在许多实践活动,尤其是一些NGO公益性项目中,社会学学者的参与度比民族学、人类学学者要大许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学的实践已经打破了所谓的“田野”框架。

由政府部门主导的实践活动,涉及民族与少数民族事务的多由民族学学者负责或参与,这似乎已成为传统,而其他需要民族学、人类学的领域,如市政规划、移民、文化传统及文化遗产保护等,近年已开始有人类学学者参与,但参与度仍然很低。因此人类学也应向西方应用人类学一样拓展至更为宽广的领域;在非政府的公益性实践方面,虽然西方人类学学者已从业于上述广阔的领域,但参与度方面在中国仍远不及社会学学者;在商业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即人类学、民族学的商业化还未形成气候。究其原因,笔者认为,由于民族学、人类学的应用研究不足、实践少、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脱节,造成学科的社会认知度低甚至被曲解,应用与实践缺乏指标体系,而适合中国的体系更不用说了,因此,已有一定基础并便于引用西方指标体系社会学在诸多实践中其影响力及所占业务量大大超过民族学、人类学。这也是一个值得中国民族学反思的问题。可喜的是,一些中国人类学学者已经开始在一些前沿的领域开展实践,如周大鸣 2000 年以来主持的世界银行系列项目及一些国际 NGO 项目^[5],这将具有示范效应。此外,包括民族学、人类学在内的文化学者的参与性及其建议不被重视。此前,虽然有诸多的应用研究成果,有顾问团和专家组,但多为辅助性质,专家的意见并不是必需的,而且在决策方面,专家意见经常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出现权力代替专业的情况。因此,需要扩大应用领域,提高专家在决策中的作用。例如,在一些国家工程项目,如水电等,环境评估已经成为一项固定的指标,而尚未被引入的人文影响评估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当然,单独依靠人类学、民族学承担一项商业服务恐勉为其难,但人类学学者可更最大限度地参与这些活动。虽然人类学、民族学的知识和方法可以在产品设计、销售、公共关系、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大有作为,但事实上有作为的很少,其原因是,相关的应用研究少、研究成果应用转化不力,或者说此学科的社会认知度低,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的投入非常少,而这些都要求学科的系统化的支持。或者说,这些活动在我国几乎还未开始。

因此,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应用实践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有专业的应用与实践民族学、人类学机构,为相关活动或商业提供咨询服务。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完善的实践系统和指标体系。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在实践活动中可能充当实践的执行者,也可承担部分工作。

(三) 实践者的网络

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专业人才,包括研究人员及研究生,大多集中在各高校及研究机构,他们主要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及教学工作,成果主要包括民族志、学术论文或毕业论文;少数就职于民族事

务、宗教、文化等职能部门,或多或少从事关涉专业的工作;大量毕业于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其他诸多行业中从事非相关专业的工作。从实践视角看,由于缺乏专业应用与实践的空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集研究、应用与实践于一体的多层次的人才梯队。实践民族学的人才系统构成可包括:基础研究学者(民族志、理论研究等)、应用研究学者、实践项目执行者(职业的或临时性的项目管理者与执行者)、专职调查人员及项目工作人员,此外还有受过民族学、人类学训练的各领域从业人员(人类学/民族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以及民族学、人类学公共课选修生)等。在这样一个学科结构及人才系统中,学者、研究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研究特长选择不同的岗位,一个人可以选择并从事一个或多个层次的工作,如一个理论研究专家可以同时承担实践项目的实施及管理工作;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在校研究生及本科生可以在实践项目中担任项目执行员(同时撰写毕业论文);毕业的研究生及本科生可在有关实践性项目中获得项目执行员的工作(临时性的或长期合同的);从事其他工作的毕业生运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理论方法及经验服务其所处的行业或领域。

从组织结构看,这是一个广泛的组织松散的网络,连接了一些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机构、应用实践组织及个人,包括那些受过相关训练但没有直接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他们以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结构为基础和途径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以研究及实践项目为导向实现组合及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全球范围内进行交流与合作。在组织机构上,由一个如民族学、人类学会这样的组织来建立联系与协调,使有关机构及人员获得学科的归宿。

实践的民族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民族学也将因开放而获得发展及社会认知度,除专业机构、专业人士的研究及实践外,受过民族学、人类学专业训练的非专业人士从事其他实践活动的方式将更有利于学科的应用化发展及推广。在实践活动中,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可以是主体或主导者,也可以是协助者,可服务于政府部门、NGO 以及商业部门,提供咨询服务或直接介入,生产包括专业作品及大众通俗作品等文化产品。此外,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与方法将作为公共意识为大众所接受。

(四) 实践者与田野

关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西方学界已根据不同的出发点提出并在多个领域进行着名为“应用人类学”“实用人类学”“行动人类学”“发展人类学”“人类工程学”等的研究和实践,其中,“应用人类学”以其较强的概括力而成为人类学此类分支学科的代表。“应用人类学”或“应用民族学”在其名称上历史地继承了其应用主体,即人类

学学者的雇佣者(殖民政府、政府、NGO及其他机构)的概念,因而在反映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的立场及与田野对象的关系上不能准确地表达其内涵。民族学、人类学作为一门来自田野或基于田野的学科,已对研究者与田野对象之间的关系做了较为适当的定位。为了突出民族学、人类学的实践取向,更好地解决“谁是应用的主体,为谁服务”的争议,较好地反映研究/实践者的中立立场及与田野对象之间的平等关系,考虑符合中国国情及民族学实践的特点,即“民族研究”、“民族工作”、民族政策及实践,同时借鉴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因此提出了“来自田野、回到田野的民族学、人类学”的概念,即“实践民族学、人类学”。^[13]

传统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的工作方向是单向的,即“田野—学术”,即便是在“参与观察”过程中,也都在努力扮演一个不干预的角色,而实践人类学学者由于其实践性,势必涉及田野干预的需要。由于干预,自然避免不了“田野侵略”的嫌疑,因而在业务上面临着诸多风险。基于田野调查及研究的传统,民族学、人类学学者们接受并小心翼翼地秉持着这样的态度、观点及原则:

(1)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态度:整体观、文化相对论、泛文化比较,力求研究中达到客观、实事求是、谨慎。^[13]

(2)关于发展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9年厄瓜多尔基多会议提出了总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发展观念:发展是对各自体内资源的运用,即应注重理应受到尊重的文化价值体系,而不仅仅是能够精确计算的经济价值体系,若没有与发展休戚相关的所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若发展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在空头支票的掩饰下对他们进行剥夺,发展就不能发生。^[10]

(3)中立价值策略、价值介入的实践策略。

(4)尊重文化的同一性和各国人民享有自己文化的权利。

(5)当地人的参与。

(6)性别因素。

(7)与地方性知识相结合。

(8)人类既是发展的动力又是发展的目标。^[11]

根据笔者的个人经验,一个实践项目必须符合目标人群的需要和目标,必须获得田野(对象)的共识、支持和积极参与,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的田野干预应限于技术支持者而非行动主体;实施者与田野的关系是平等的,在项目过程中的身份表达需适合当地的社会文化。

四、余论:基于中国实践的民族学、人类学海外实践

随着当代中国的开放及经济崛起,中国的商品及服务、中国企业及中国游客遍及世界,孔子学院发展迅速,中国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国际关系层

面上来说,屡遭经济制裁、邻国失睦、和平崛起被负面化,而就单个的企业、个人或业务来说,则遭诸多的不顺。原因是多方面的,固然包括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不乏缺少对海外的了解,以及海外对中国的了解,这些都构成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风险”,这也是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大挑战和大机遇。

与西方人类学的海外田野及海外研究传统不同,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主要专注本土研究,就学科而言,远未形成完善的学科体系,而且国内应用研究及实践缺乏,国内认知度仍然很低……在民族学、人类学海外研究方面,最初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方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民族志的翻译及介绍。近年,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学者展开了针对海外的民族调查研究。例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高丙中带领的“12国民族状况研究”^[12]、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工作坊成果包括《海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等;云南大学“211工程”三、四期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民族学学科高地建设规划项目等支持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其中“211工程”三期已有多部海外民族志面世。然而,在此种背景下,要在海外开展民族学、人类学实践活动,仍然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但由于时不可待,实践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以应对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海外实践是中国实践的延伸,这本身是一个大选题,同时也是一个难题,还需开展专门的研究,由于篇幅有限,此处仅略表看法:

(1)实践要求并将最终建立基于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实践的海外实践系统,即基于中国(文化)视野,以汉语重写世界知识的系统,此间中国与世界平等地分享话语权。

(2)海外民族志对一国社会文化研究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需长期持续进行,从主体民族开始,逐渐涵盖其他族裔、人群及团体。国内高校,如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已展开了对于周边国家的民族志研究并获得一些成果,但积累还远远不够。

(3)在基础研究不足、民族志缺乏的情况下,可先对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包括该国学者及西方学者的成果进行整理、翻译,使之按需向应用研究及实践转化。

(4)运用民族学、人类学方法,针对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或相关领域,如公共外交、商业等开展快速田野及应用研究并开展相关活动。

(5)研究其他国家对我周边国家的研究及实践,如美国、欧洲、日本、印度等国对东南亚国家的研究及其在公共外交、商业领域的实践,吸取有关经验。

(6)鉴于海外实践与国内实践不同,研究及实践活动需以对目标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的了解为前提,开展与其他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公

共外交、商业研究的合作。

(7) 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海外研究及实践队伍。

(8) 重视本土学者的参与,针对一些国家或相关领域的研究形成一个以中国学者为主导的全球性的专家团队,以项目为导向吸收当地及西方学者的加入,这一方法在此前西方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研究中十分有效,特点是收效快、成本低。

(9) 民族学、人类学海外实践可涉及领域:文化领域(宗教、社会文化、国民性)、政治(民族主义、国家变革等)、商业应用研究、公共外交、汉语及中华文化推广。

(10) 研究成果的快速转化,开发一些文化产品,如针对中国公民的“入境须知”“投资指南”等,使用纸质媒体、网络社交平台、手机网络平台等进行发布,为我国游客及商务人士提供信息支持。

作为一个新的领域,民族学、人类学的海外实践将在实践中获得发展。

[参考文献]

[1] 石奕龙. 应用人类学[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

[2] 李秀国. 应用人类学纵横谈:访谢剑博士[J]. 东南文化,1991(5):119-123.

[3] 梁正海.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学应用研究述论[J]. 贵州民族研究,2006(5):86-92.

[4] 周星. 应用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实践[J]. 社会科学战线,1990(3):330-340.

[5] 周大鸣. 应用人类学与中国实践[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133-138.

[6] 胡鸿保. 当前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从学科史和互学科性角度谈起[J]. 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56-59.

[7] 威廉·A. 哈维兰. 当代人类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8] 夏建中. 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9] 林耀华. 民族学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0] 陈庆德. 发展理论与发展人类学[J]. 思想战线,1998(8):45-46.

[11] 王戈. 应用人类学研究的新篇章:“寻求内源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述评[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195-196.

[12] 唐红丽. 到海外研究一个“真实的世界”[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2-13(A01).

(上接第 92 页)

[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73:3002.

[4] 王芑孙. 读赋卮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381.

[5] 陈勤建. 文艺民俗学导论序[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10.

[6] 王先谦. 汉书补注[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07.

[7] 纪昀. 四库总目提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8] 范曄.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9] 王充. 论衡[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0] 任继愈. 中国藏书楼(一)[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376.

[11] 萧绎. 金楼子[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844.

[12] 李善. 文选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 陈寿. 三国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4]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 严可均. 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16]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771.

[17] 魏征.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18] 陆云. 陆云集[M]. 黄葵,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8:146.

[19] 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650.

[20]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392.

[21]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22]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3] 李百药. 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24] 令狐德棻. 周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1.

[25] 葛洪. 西京杂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6]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36.

